

# 符号系统的主体与他者： 论本维尼斯特对克里斯蒂娃的影响

张颖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4)

**摘要** 法国语言学家埃米尔·本维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的语言学理论是索绪尔语言学线索上的重要支脉之一。他在话语行为以及语言活动中的主体性等方面的研究,直接影响了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符号心理分析”(sémanalyse)理论的建构。一方面,本维尼斯特对于“说话主体”(le sujet parlant)的发现,影响了克里斯蒂娃的“过程中的主体”理论,而后者将前者看成是重要的、必须超越的边界,对其进行批判性地思考;另一方面,本维尼斯特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引入语言学的研究中,直接影响并促使克里斯蒂娃在“象征态”的符合句法规范的语言中寻找异质的、他者的“符号态”。最后,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心理分析”理论是符号学本身自我批判、自我修正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 本维尼斯特; 克里斯蒂娃; 说话主体; 他者; 符号心理分析

埃米尔·本维尼斯特(1902—1976)是与克里斯蒂娃同时代的法国结构主义运动中重要的语言学家、哲学家。他的语言学理论关注话语行为而非语言结构本身,话语不再等同于抽象的、自给自足的语言系统,它是“行动中的语言”,从而转向了注重实际的语言运用,突破了自索绪尔以来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立场。然而国内研究大多倾向于认同索绪尔理论对法国结构主义运动的深远影响,本维尼斯特的语言学理论的重要作用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对本维尼斯特语言学理论本身的研究也稍显滞后<sup>①</sup>。

我们发现,在众多法国结构主义者如巴尔特、克里斯蒂娃以及拉康的重要论著中,本维尼斯特的语言学理论被给予充分重视,甚至直接成为他们理论建构的触发点,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本论文首先将区分索绪尔与本维尼斯特理论的基本分歧,同时,从语言系统的主体与他者两个维度论证克里斯蒂娃在“符号心理分析”的理论建构中对本维尼斯特理论的继承与突破。

## 一、跳出结构和关注言语

相较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本维尼斯特的语

言学理论的特点是什么?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首先找到索绪尔与本维尼斯特语言学理论的两大主要分歧:1. 研究对象;2. 语言的主体。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是以探究意义如何生成为宗旨,发展到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意义仍然是语言学的研究目标,只是研究的对象发生了变化。本维尼斯特对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现在语言学研究在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学科中占据一席之地,同时,是理论研究和科技发展最为活跃的科学之一。这种新的语言学起源于索绪尔,从索绪尔的理论中寻找方向并具体化。”<sup>②</sup>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区分了语言和言语两大范畴,并将其语言学的研究完全倒向语言的阵营,言语活动被束之高阁,“要解决这一困难只有一个办法:一开始就站在语言的阵地上,把它当作言语活动的其他一切表现的准则……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分类的原则。我们一旦在言语活动的事实中给予首要的地位,就在一个不容许做其他任何分类的整体中引入一种自然的秩序”。<sup>③</sup>言语,在索绪尔看来,是多方面的、性质复杂的、跨越多个领域的,没有内在的同一性,无法对个体的言语活动

收稿日期 2014-07-20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13&ZD123)

进行抽象和概括,而语言研究,则是把握言语活动的一般规律,具有可操作性。本维尼斯特正是从被索绪尔所搁置的言语行为的研究出发,跳出索绪尔所设定的封闭的语言系统,转向话语研究。

在索绪尔的研究中,意义是一种符号区分的功能而已。所有的语言活动都是按照语言本身的结构而进行的符号象征活动。索绪尔理论所着重讨论的“系统”概念,实质上是语言的整体概念,或者说是不同语言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索绪尔看来,这种相互关系是对称的,或者说是均匀的,这样才能保证符号系统内部的自洽和稳定。

本维尼斯特在对语言符号研究时,他质疑了符号的价值,认为符号的概念本身是阻挠语言符号研究的障碍,而要想弄清符号之外的部分,就需要跳出符号(或者说概念)本身。而在克里斯蒂娃,她将这种理念发展成为对如何跳出静态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所存在的局限的研究,她的符号学理论试图研究被索绪尔所忽视和排除的结构之外的东西,即“结构”前后的东西,创造和破坏“结构”的东西,渗入“结构”和溢出“结构”的东西等。如何赋予静态的结构以对立的形态,如何把握“结构”外部的内容,如何把握“结构”内部各要素之间不均等的相互作用成为克里斯蒂娃的努力方向。

本维尼斯特否定了索绪尔对于“系统”的过分强调,认为语言符号的意义并不是结构的内部差异所致的,语言本身是一种交流的工具,语言是运动的,它的本质就是话语或者不同言说者之间的对话。“语言是有关人的,它是人类的精神和文化生活之间的交互点,同时,它也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的工具。这种语言学应当是建立在三项式的术语基础上:语言、文化和个性。”<sup>④</sup>本维尼斯特的这段论述最早是发表在1954年的《心理学杂志》(Journal de Psychologie)上。

关注语言的对话性质,成为本维尼斯特语言学理论的重要成果之一。语言不再是封闭和自足的,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通过话语来实现对话和交流,语言转变为动态的存在。克里斯蒂娃1966年从保加利亚到达法国,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界被结构主义的思潮所统领,受索绪尔的影响,此时的法国学术界倾向于将人类行为的研究归属到语言普遍规律的“意义系统”研究中去。敏锐的克里斯蒂娃很快意识到语言的对话性质在结构主义的研究中被忽视,“语言预设了对话关系。然而这种语言的‘对话性’特征,在结构主义对语言学的借鉴中并没有被纳入思考,无论是俄国形式主义,还是法国结构

主义,都没有真正对语言的对话性产生重视。”<sup>⑤</sup>没有准确的文献资料显示,初入法国的克里斯蒂娃对语言对话性的关注是受到本维尼斯特的影响,她的早期论文《词语、对话和小说》(Le mot, le dialogue et le roman)<sup>⑥</sup>表明她此时关于对话的研究,是直接受益于对俄国后形式主义学者巴赫金的译介。然而,我们发现,克里斯蒂娃与本维尼斯特对“对话性”的关注,并非偶然的巧合,二者均是试图超越结构桎梏的理论实践,是遥相呼应的关系。

回到索绪尔,在他的语言学思想中,作为个体的语言的主体从未成为他关注的对象,他所研究的语言是脱离了说话主体和言说的社会语境的抽象概括。在他看来,对具体人类言说活动的研究,最终可能会对业已形成的语言系统观念构成潜在的挑战,一切皆在系统中。本维尼斯特批判了索绪尔对语言主体研究的忽略,他认为:“索绪尔越来越确定他自身理论的合理性,与此同时,他与同时代的理论相疏远,这种对理论作为真理的确信,使得他拒绝任何有关语言的主体的讨论。”<sup>⑦</sup>

本维尼斯特关注话语主体,也就是言语的使用者,主体被放置在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抽象的语言系统被实际的语言运用所取代,而语言的使用者——人的重要性被凸显出来。克里斯蒂娃认为,将主体的概念引入到语言学的研究中,这是本维尼斯特的语言学理论的重大突破。1980年,在一篇题为《知识渊源》(Intellectual Roots)的采访中,克里斯蒂娃承认本维尼斯特语言学的话语研究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一道,形成了她理论建构的基础。在被问到本维尼斯特如何影响她的理论实践时,她指出:“本维尼斯特的工作很重要,因为他看到了将主体的概念引入语言学的必要性。尽管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也认识到说话主体的位置(尽管是笛卡尔的主体层面讨论),但是与本维尼斯特的语言学相比较,后者打开了话语内部语义学和交互主体的领域。本维尼斯特所试图寻找的,并不是有限条件下可生成规范性句子的语法规则,他希望建构一种话语语言学,这也是他正致力完成的工作。换句话说,在话语语言学理论中对象、语言完全发生了改变。语言不再是索绪尔所认为的符号系统,也不是生成语法层面的对象,是由假定是笛卡尔式主体所产生的句子。”<sup>⑧</sup>

这段论述涉及克里斯蒂娃对本维尼斯特语言学理论的几个重要认识,1. 本维尼斯特将主体理论引入到语言学研究;2. 本维尼斯特从话语内部语义学和交互主体领域进行研究;3. 本维尼斯特的“说

话主体”依然是笛卡尔式的主体。而克里斯蒂娃正是从这三点批判性吸收了本维尼斯特的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从而开展自身的理论实践。

本维尼斯特的新的语言学理论涉及主体和主体性的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他的语言学理论将谁在说话(各种不同人称)作为研究对象。语言是一种主体之间交流的工具。人总是通过与他者的言说来存在的,语言确定了人的定义。人是一种言说的主体,正是在言说中或者通过语言,人才能够成为一个主体,“人将自己作为主体进行确立,正是在语言之中,同时取决于语言活动。这是因为,实际上,唯有语言活动,在作为存在的现实和言语活动的现实中,建立了‘自我’的概念。”<sup>⑧</sup> 我们可以看出,主体是言语行为的主体,通过言语活动(对话),使用句子,从而确定自我的完整和统一。

而主体性,在本维尼斯特看来,讨论的是作为个体的言说行为的一般性,“我们在此讨论的主体性是指说话人将自身假定为主体的能力……它是作为一种精神的统一性,这种精神的统一性在超越所聚集的实际经验的整体的同时,形成了意识的永恒。”<sup>⑨</sup> 所以,本维尼斯特的主体是语言表达行为实施的主体,主体是通过话语行为将自己的主体性作为统一的内容表现出来的。

那么本维尼斯特的话语研究的路径是如何影响克里斯蒂娃的理论建构?克里斯蒂娃是如何吸收并突破本维尼斯特的主体观,来研究具体的意指实践(如诗性语言)呢?

## 二、“说话主体”与他者

本维尼斯特认为,语言本身就已经天然地包含说话的角度问题,也就是“谁在说话”对于语言学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用话语或者对话取代了索绪尔的系统观。那么“谁在说话”,所牵涉的就是言说的角度问题。

本维尼斯特从语言符号系统本身出发,在总结一系列的语言现象后,他试图通过人称代词来表示说话者之间的角度问题。他认为“*I*”(我)和“*you*”(你)两个代词,处在语言符号的相互指涉的关系中。首先,这两个代词在人称中是互补的,“*I*”是指言说中包括语言交流‘*I*’的话语的个体,通过引入‘接收者’这个概念,‘*you*’和‘*I*’是相对应的,‘*you*’是指包含着语言交流‘*you*’的被说话的对象,这两个词是处在语言的同一个范畴之中,与它们在语言中的位置相关。”<sup>⑩</sup>

从他关于人称代词的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

出本维尼斯特的说话主体,并非属于独立、单一的主体,而是主体间性的。简而言之,我在说“我”的时候,也就自然意味着“你”的存在,同样地,说“你”也就意味着“我”的存在,即只要是话语,就必然涉及两个主体之间的对话(你们和我们是你和我的关系的延伸)。这种关系,也就是话语的发出者(自我)和话语的接收者(他者)之间的关系。

本维尼斯特“人称的两极”(polarity of persons)理论认为,在对话关系中,自我和他者的关系,是既对立又互补。我使用“*I*”这个单词,意味着我认为有某个“*you*”的接受者存在,那么在这个接受者将他自身看成是“*I*”时,我变成“*you*”。从这一点上看,自我与他者还是可逆的。尽管二者是不能等同的或者对称的,在任何场合下,都会存在着先验的位置的区分,主体只能通过“*I*”来产生,但是两者的位置可以发生改变。

通过在语言的交流中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对话关系的讨论,本维尼斯特注意到,在语言表达中,只有在被规定的瞬间,只有在被规定与语言表达行为的主体与接受者的关系之中,意义才得以存在。因此,“自我”和“他者”是只能根据现实的使用情况才能确定意义的词,而本维尼斯特认为这是侵入到语言中言语存在的痕迹。简而言之,在语言的传达中,非语言本身的材料被保留下来,这是受到外在的文化规约或者其他的外部现实因素影响残留下来的痕迹。

对语言中代词“他”的发现,进一步强化了异质的他者的存在合理性。本维尼斯特指出,除去“你”“我”这两个人称代词之外,还存在着“他”——这一不在场的缺席者。“在效果上,‘我’和‘你’形成特殊的统一,正在言说的‘我’和正在听我言说的‘你’每次都是一致的,但是‘他’却是不确定的主体,或者干脆就不存在”<sup>⑪</sup>。也就是说,在言语活动中,你和我是可逆的,但是他无论在哪一种语言活动中,都是处在“你”和“我”之外的,扮演着多余的角色。于是,他成了语言中非主体的存在。有学者指出“这样的情形有些恐怖,很像是一种非语言的语言,充满着不确定的语言”<sup>⑫</sup>。语言系统中存在的他者的理论,被本维尼斯特通过对人称代词的研究确立下来。而克里斯蒂娃对本维尼斯特的这一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通过她的“过程中的主体”概念来论证的。

克里斯蒂娃在她的国家博士论文《诗性语言的革命》的第一章,就提到了现代语言学研究的两种趋势,她认为有一种趋势“是在形式论的‘符号过

程’的层面讨论问题,被严格地归入语用论和语义论中。通过提出阐释主体概念(在本维尼斯特、库莉奥莉的层面),这种理论将逻辑的形式关系、预先假定的关系和言语行为的对话者之间的关系放置在深层的结构中。阐释主体的概念,直接来源于胡塞尔和本维尼斯特,它通过范畴直觉引入语用领域、逻辑关系,以及具有语言学和超语言学两种特征的交互主体关系。”<sup>⑭</sup>

与胡塞尔现象学意义上的主体一致,本维尼斯特所讨论的“说话主体”是阐释主体。尽管对这类主体的研究是从深层次研究交互主体之间的关系,主体性和个体性是通过言语行为来确立的,但是这类主体使用符号,创造句子,传达意义,本质上仍是笛卡尔式的理性的主体,也就是克里斯蒂娃所谓的受社会律法规范的“象征态”的主体(下一部分将详细论述)。于是,克里斯蒂娃的主体理论是从本维尼斯特出发,在吸收他的主体理论的“说话主体”的部分特点的同时,将其作为必须逾越的边界。

“(我的学术研究)第一个方向是对‘说话主体’的研究,包括主体性与阐述行为(acte de l'énonciation)的研究,而不仅关注作为阐述结果的话语。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是我的老师。法国新近出版了一部本维尼斯特的书,是他在法兰西著名教育机构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所上的课;我为此书写了序。本维尼斯特对我的帮助很大”<sup>⑮</sup>。借鉴了本维尼斯特对说话主体的关注,克里斯蒂娃将对主体性和阐述行为的研究作为挑战语言本身的系统和结构的努力。

如何超越本维尼斯特的主体以及胡塞尔的现象学层面的主体?如何质疑并超越受到社会律法规范的、语言的逻辑意义层面的主体观?对克里斯蒂娃而言,本维尼斯特最大的影响,是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引入到语言学理论之中,并将其服务于主体的运作。

克里斯蒂娃在一篇题为《克里斯蒂娃面对面》(“Julia Kristeva in Person”)的采访中谈道:“正如我所说的,在我初到法国时,我并不十分了解弗洛伊德。本维尼斯特对我的影响很大。他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对哲学和精神分析很感兴趣,他是少有的几个将弗洛伊德理论吸收进自身研究的语言学家之一。他发表过一篇有关弗洛伊德研究的论文,拉康让他讨论在弗洛伊德理论中语言所扮演的角色。这篇论文被收录到他的论文集中,对我而言,这篇论文提供了对弗洛伊德和他所建构王国的

权威介绍”<sup>⑯</sup>。这篇论文即收录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论弗洛伊德理论中语言的功能》(“Remarks on the Function of Language in Freudian Theory”)一文,这篇文章对于了解克里斯蒂娃从本维尼斯特理论中所吸收的营养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这篇文章中,本维尼斯特谈到一种特殊的话语形式,即精神分析师与被分析者之间的话语。在这类话语形式中,分析者所关注的就是对方的话语,分析者从被分析者话语行为中发现破绽。他说:“分析者在那里探索的是新的内容,是来源于被完全隐藏起来的带有无意识性的动机的内容。在语言中固有的象征体系的另一面,分析者感受到的是另一种特殊的象征体系,是由分析主体无论是否叙述出来,都同样构成的,而且是在主体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构成的。”<sup>⑰</sup>在精神分析的工作中,被分析者进行“自由联想”,分析者通过对话对被分析者无意识进行干预,从而发掘隐藏在被分析者无意识中的内容。这与释梦的原理是类似的,通过对梦的解析,挖掘隐藏在无意识的梦者的驱力(pulsion)。在被分析者的“自由联想”的过程中,存在着另外一种“言语活动”,这一套言语活动与被分析者规范性的语言活动是同时存在的,源自于无意识。本维尼斯特指出:“在我们看来,分析师所遇见的,进行连续地详细检查的(被分析者)的全部症状,是被分析者在无意识层面原初的动机的产物。”<sup>⑱</sup>

由此可见,本维尼斯特从关注人称代词发现存在于对话关系中的“他者”,发展到关注存在于对话系统中的无意识层面的非主体性的东西,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成为至关重要的工具。作为一般语言学研究忽视的内容,无意识扮演着他者的角色。正是从本维尼斯特开始,无意识的运作与语言学紧密联系起来。受到本维尼斯特的直接影响,克里斯蒂娃将处在无意识领域的驱力和律法、客观真理以及制度支配之下的文化空间结合起来,探讨主体的状态。

克里斯蒂娃运用存在于无意识中的驱力来反抗受律法控制的、规范性的言语活动,从而颠覆统一的主体的理论。主体不再是理性的、意识统一的主体,而是成为无意识与意识相结合的主体。所有言语活动的对话本质和对立物的并存,社会、历史以及其他因素嵌入到符号系统之中,言语活动表意行为的复杂性,意义与非意义的混杂,主体与非主体的共存,使得意义被分割,从而突破单一的逻辑,呈现出一种多元化。克里斯蒂娃早期的符号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意义生成性”(la signifiante),所

着重讨论的就是意义从萌芽状态到能够传达的整个动态的生成过程。“准确地说,是指无限的、无尽的生成过程,欲望朝向语言、在语言之中并通过语言不停歇地运作,同时朝向交换系统、在交换系统内、通过交换系统以及在主体和它的机制中持续的运作过程。”<sup>⑧</sup>而这种“意义生成性”与意义(significant)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是通过研究后者(所呈现出来的意义)中所隐藏的异质的他者,从而深入到对诗性语言和文学语言的解剖中。相较于传达性的、表层的意义,克里斯蒂娃更注重探讨隐藏在这种表层之下的生成模式,而正是这种动态的生成过程,打破了符号系统的封闭的格局。

### 三、“符号态”与“象征态”

那么克里斯蒂娃是如何建构和论证处在无意识层面的、非主体性的东西呢?我们需要回到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心理分析”理论的核心概念,即“符号态”(le sémiotique)与“象征态”(le symbolique)以及二者的辩证关系中。

克里斯蒂娃认为:“我们所谈及到的两种趋势提及了同一意指过程的两种模态(deux modalités),第一种趋势是‘符号态’,第二种是‘象征态’。这两种模态在组成语言的意指过程中是不能分割的,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决定了话语的不同类型(叙述、元语言、理论、诗歌等),换句话说,所谓的自然语言允许两种模态的不同的分节模式。另一方面,同样存在着非言语的意指系统,它只建构在‘符号态’的基础之上(比如音乐)。”<sup>⑨</sup>由此可见,在克里斯蒂娃的理论中,一方面,这两种模态不同的分节模式决定不同的话语类型,另一方面,存在着只建构在非语言上的意指系统,即“象征态”离场的意指活动。

“符号态”,在克里斯蒂娃看来,是一种人类经验中受驱力影响的维度,它冲破或者混合进入(象征态),“是一种模态,完全异质于意义,但是处于意义之中。”<sup>⑩</sup>这种“符号态”可以看成是一种现实的停顿,它逾越语言之外,是传达性的语言的他者。这就涉及克里斯蒂娃对意义的认识,她认为意义并非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所认为的那种符号系统,而是一种意指过程,传统的符号学领域的意义是一种静态的、稳定的分节,但是“符号心理分析”所试图把握的“意义”却包含一种动态的、前语言的操作。

其次,“符号态”表现为一种古老的、原初的精神活动状态,这种状态与婴儿话语(主体)的形成过

程有一种紧密共生的关系。“符号态”是用来表示一种建立在痕迹和标记基础之上的意指操作,而不是符号,标记是言说的身体的欲动的标记,而痕迹就是弗洛伊德所谓的原初过程。“符号态”在任何传达性的语言活动继而扩大至后启蒙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都是受到压抑的,而克里斯蒂娃对这一种模态的强调,是试图打破这种压抑,在她看来,这种颠覆和打破主要体现在先锋艺术和狂欢话语、精神病人话语中。

“符号态”是一种特别的口头形式,身体的能量和效果通过某种方式进入语言,它包含着主体的欲动和分节,尽管它是口头表达的,但是它并不服从于一般的句法规则。如诗性语言中所蕴含的、如音乐般的韵律和节奏的变化,绘画艺术中色彩的变化等,往往是“符号态”活动在发生作用。

相反,“象征态”是与历史、社会以及外部的意识形态相连接的。它是语言符号及其符号体系所在的领域,同时也是使得对象确立的主体成立以后的领域。法国结构主义理论所研究的不同的符号体系结构,如列维-斯特劳斯关于亲属关系的研究,所研究的都是受社会律法所制约的、文化空间内的、各种社会性象征之间的活动。说话主体在“象征态”模式下表达明确、清晰的意义,科学表达或者逻辑表达是典型的象征语言的使用。克里斯蒂娃所试图界定的主体的分水岭正处在这个位置。本维尼斯特的“说话主体”同样是“象征态”中所确定的主体。

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这两种模态之间的辩证关系,克里斯蒂娃认为“准确来看,因为两种意指过程的模态中存在着辩证关系,它是由主体构成的。因为主体既是‘符号态’的,又是‘象征态’的,由主体产生的任何意指系统不可能是单一的某种模态,它必须是两种意指活动共同的结构。”<sup>⑪</sup>

可见,这两种模态之间并非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和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符号态”与身体相联系,面对的是意义生成的动态的过程,而“象征态”与外部世界紧密联系,面对的是历史、社会以及意识形态的外部,任何语言活动都是这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克里斯蒂娃所谓的“过程中的主体”是由这两种模态共同作用形成的,不同于西方哲学中理性的统一的主体。由于“符号态”的存在,主体总是处在崩溃和重组的过程中,处在夹杂着“符号态”和“象征态”的纠葛和斗争中。简言之,尽管我们总是使用意指活动的“象征态”来阐明一种立场,但是这种立场会在“符

号态”的欲动和分节之下被破坏和失去稳定,从而将一种非意义的、无意识运动效果带入到“象征态”中,从而打开“象征态”的封闭的状态,赋予它对话性和开放性,最典型的如诗性语言。克里斯蒂娃利用“符号态”和“象征态”的这两个意指模式,试图在肉体与精神、意识与无意识、自然与文化之间寻找沟通和对的可能性。

我们发现,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理论,正是对本维尼斯特发现语言中存在的“他者”的呼应和具体化的阐释。借助于精神分析的理论,克里斯蒂娃将语言中的异质性细化,并将“异质性”的运作放置在“符号态”的动态的运作过程中。可以认为,本维尼斯特对于传达的语言活动中存在的非语言的、非主体的痕迹的发现,把与语言异质的内容纳入语言学的研究中,直接影响了克里斯蒂娃对于诗性语言中所存在的“他者”的讨论。而本维尼斯特对于精神分析领域中分析者和被分析者之间对话特征的考察,与克里斯蒂娃通过符号学研究无意识的再现紧密相关,甚至可以看出是她提出“符号态”和“象征态”辩证关系的最早的表现形式。

## 结 语

本维尼斯特是处在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浪潮间的重要的语言学家和哲学家,他主张语言学研究应回到话语实践中,拒绝将视野放置在符号或者符号系统的结构本身,同时认为语言自身就已经先天地包含了说话角度的问题,语言的本质就是主体之间的对话。

我们认为本维尼斯特从话语实践出发建构的理论体系,对克里斯蒂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本维尼斯特对于“说话主体”的发现,影响了克里斯蒂娃的“过程中的主体”理论,二者均认为主体通过现实的言语活动来实现。然而,对于主体的性质,克里斯蒂娃又将本维尼斯特的理论当作是重要的、必须超越的边界,对他的主体观进行批判性地思考。

另一方面,本维尼斯特理论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引入到语言学的研究中,直接影响并促使克里斯蒂娃在“象征态”的符合句法规范的语言中寻找异质的、他者的“符号态”。

本维尼斯特发现了线性符号上存在着具有其他意义的东西,克里斯蒂娃发现了隐藏在诗性语言中的、无意识层面“符号态”的运作。二者都打破了对符号的常规的认识,挖掘出传达性的语言中所存

在的潜在力量。符号不再是稳定的统一体,符号的意义是不确定的,符号的意义处于一种动态的生成过程中。符号表意活动是意义和非意义的集合体,意义表现在,具有逻辑意义、以传情达意为目标的语言,仍然是人类表意活动的基础;非意义表现在,在符号体系的高楼大厦内涌动的是永不停歇的无意识活动的运作,它们试图在符号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使得人类意识中所追寻的意义始终处于一种不确定的流动过程之中。

本维尼斯特和克里斯蒂娃对对话和异质性的强调,无疑颠覆了逻各斯中心主义语言观的意义确定论,威胁到意义、真理、主体、律法等概念的独立性、稳定性和纯粹性,同时在某种程度上瓦解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符号概念本身的内涵都被质疑。

克里斯蒂娃认为:“符号学不能被归入一种科学,更不用说被归入某种特定的科学,它应当是一种开放的研究,不断地回归到自身,在进行自我批判的同时自我完善。”<sup>⑧</sup>本维尼斯特以及克里斯蒂娃的理论实践,均是在符号学的框架内注入非意义的异质性的内容。从整个符号学的宏观发展来看,我们认为,这是符号学理论作为一种具有强大批判性、解构性、规约性理论自我批判、修正的结果。

## 注释

①本维尼斯特的语言学论著 *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Editions Gallimard, 1966. 英译本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1 年出版,而中译本《普通语言学问题》直到 2008 年才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王东亮译。

②⑦ Benveniste, Emile. “Saussure after Half a Century.” In Mary Elizabeth Meek, trans.,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 Florida: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1, 39-40, 35.

③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 30 页。

④ Benveniste, Emile. “Recent Trend in General Linguistics.” In Mary Elizabeth Meek, trans.,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 Florida: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1, 14.

⑤⑩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的继承与突破》,黄蓓译,《当代修辞学》2013 年第 5 期。

⑥朱丽娅·克里斯蒂娃:《词语、对话与小说》,张颖译,《符号与传媒》2011 年第 2 辑。

⑧ Kristeva, Julia. “Intellectual Roots.” In Ross Mitchell Guberman, ed., *Julia Kristeva Interview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15-16.

⑨⑩ Benveniste, Emile. “Subjectivity in Language.”

In Mary Elizabeth Meek, trans.,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 Florida: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1, 224.

⑪ Benveniste, Emile. "The Nature of Pronouns." In Mary Elizabeth Meek, trans.,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 Florida: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1, 218.

⑫ Benveniste, Emile. "Relationships of Person in the Verb." In Mary Elizabeth Meek, trans.,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 Florida: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1, 199.

⑬ 尚杰:《本伍尼斯特的语言哲学观》,《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⑭⑰⑱⑳ Kristeva, Julia. *La Révolution du langage poétique L'avant-garde à la fin du XIX<sup>e</sup> siècle, Lautréamont et Mallarmé*. Paris: Seuil, 1974, 19-20, 15, 22, 22.

⑯ Kristeva, Julia. "Julia Kristeva in Person." In Ross Mitchell Guberman, ed., *Julia Kristeva Interview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15-16.

⑰⑱ Benveniste, Emile. "Remarks on the Function of Language in Freudian Theory." In Mary Elizabeth Meek, trans.,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 Florida: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1, 65, 65.

⑳ Kristeva, Julia. "From One Identity to an Other." In Leon S. Roudiez, ed.,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136.

㉑ Kristeva, Julia. "Semiotics: A Critical Science and/or a Critique of Science." In Toril Moi, ed., *The Kristeva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86, 77.

责任编辑 王雪松

## Subject and Other of the Semiotic System : On the Effects of Benveniste on Kristeva

Zhang Y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Abstract :** The linguistic theory of French linguist Emile Benvenist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branches of Saussurean linguistics. Benveniste's researches on discursive activity and subjectivity of language activity directly affect the theory construction of Julia Kristeva's sémanalyse. On one hand, Kristeva's subject-in-process theory is obviously influenced by Benveniste's speaking subject who is challenged and criticized by the form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troduction of Freud's unconscious theory to language research raised by Benveniste directly affects and motivates Kristeva's investigation of the heterogeneous Other namely "the semiotic" raised by Kristeva in the communication language. Kristeva's sémanalyse is an embodiment of self-criticism and correction of the semiotic theory.

**Key words :** Benveniste; Kristeva; the speaking subject; Other; sémanalyse